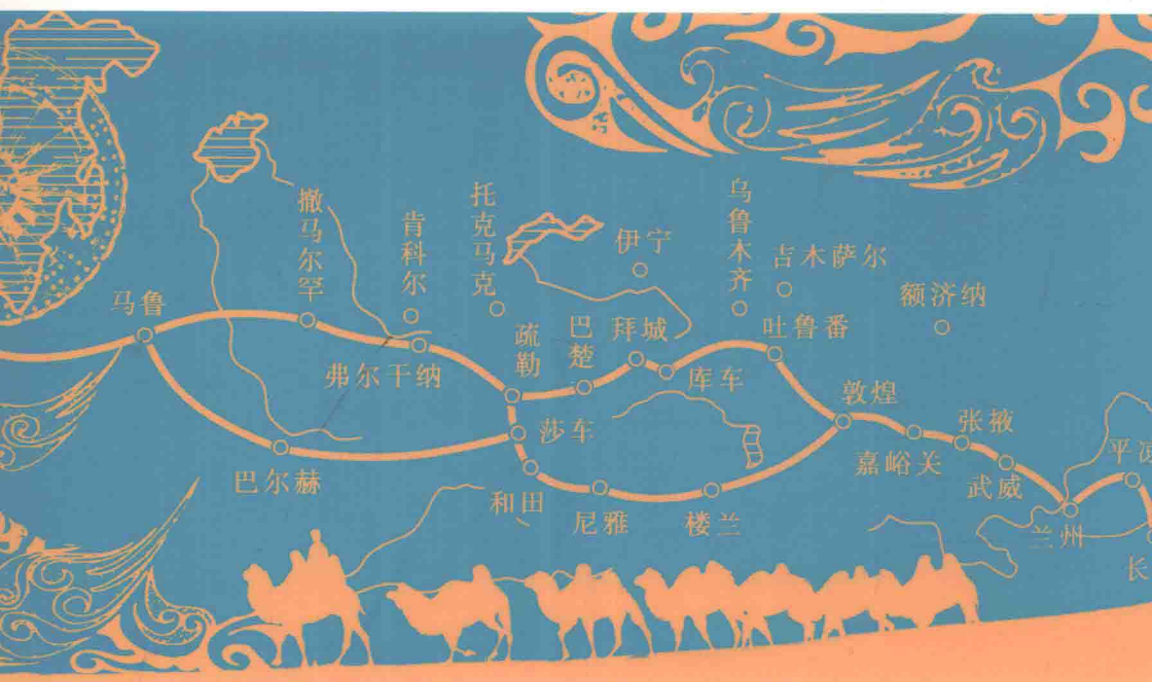




何芳川◎主编

中外文化交流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

何芳川◎主编

上
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交流史:全2卷/何芳川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6. 1
ISBN 978-7-5125-0826-2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中外关系—文化交流—
文化史 IV. ①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6242号

中外文化交流史

- 主 编 何芳川
特邀顾问 曾 勇
总 策 划 葛宏峰
责任编辑 戴 婕 宋亚珏
统筹监制 张 坤 危玉良
策划编辑 闫翠翠 崔慧超
美术编辑 秦 宇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70.5印张 10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826-2
定 价 200.00元(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
上要研究西学东渐
更不可忽视东学西
渐因为中西文化
是在东化和西化
的双向互动中不扬
光大的

季羡林

原成著





高丽青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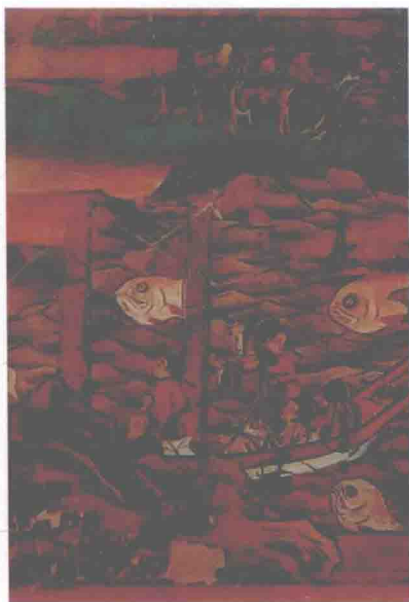
玄奘负笈图



郑和像



收藏于西班牙托莱多国立图书馆的中文版《堂吉珂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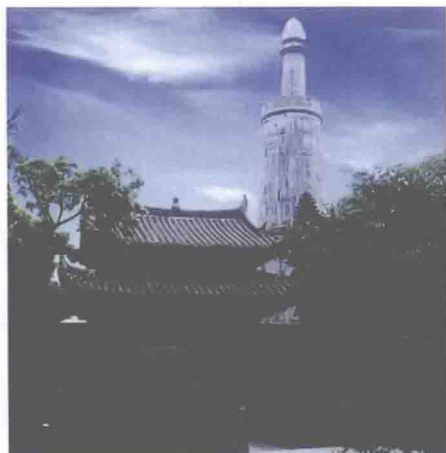


鉴真东渡图



鉴真大和尚遗像

图片均由：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提供



广州杯圣寺

又名狮子寺，俗称光塔寺。位于光塔路，相传建于唐朝，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兴建的清真寺



郑和像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二十一回插图



越南河内文庙

再版序

吴志攀

何芳川老校长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将要再版了。这部大书，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的心血结晶，或者说，这部书是他的生命与思想、他的人格与才华的延续。只要书还有人读，学人的精魂就不散。

这些年来，我常常把两册书放在案头。疲惫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捧起来翻一翻，思绪飘远，脑筋一下子就放松了。读读历史，尤其读读文化史，会让人（尤其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写书的人）明白：人当然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化，但人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文化所化之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我们应该“有所为”，努力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为人类文明向着光明的一面发展而奋斗，但与此同时，也应清楚自己的局限，古往今来，能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人能有几个？个体的命运与文化的命运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了。

许多的苦苦挣扎，在后人看来（假如有幸被后人记起、看到的话），都不过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明。所以，谦卑地面对历史，保持平和清净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或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人生态度。

每次捧起这部书，我也总会想起何校长的音容笑貌。他从行政领导岗

位上退下来之后，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很多想写的文章，每次听他聊起来，我都感到振奋。他的家学渊源和人生阅历，不是我们能比的。年轻的学人，或许“有字书”能读得更多，但论读“无字书”，很难再有人超过他了。他的视野开阔，心态开放，才气纵横又为人谦和，最适合做学术事业的领袖。《中外文化交流史》正是他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可书差不多编完，将要交付出版的时候，他却倒下了。后来书出版了，我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每个人的发言都带着感情，还有人流了泪。

何校长编《中外文化交流史》，还是向他的老师周一良先生的致敬之举。周先生晚年也曾主编过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影响较大。马克垚、郝斌、林被甸三位老师曾经联名在《世界历史》上发过一篇评介文章，其中就提到过这前后两部交流史之间的关系。周先生的那一部，是“我国第一部按国别、地区反映中国与外部世界两千年文化交流的大型综合性著作，也是一项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学术成果”，而过了20年，何校长再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把这个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集合起来，体现了北大史学的薪火相传。

想想周一良先生的人生，再想想何校长的一生，会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出身世家、少年成名、才华过人、半生坎坷……我没有机会拜见周先生，但读过《毕竟是书生》，也听过北大老人们讲的故事。我想，他们师生俩、两代北大史学家，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真能反映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学问与精神，应该被继承下来。

二

为了写这篇再版序，我花了几周时间，重读了全书。书成于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前些年，北大还出了好几套类似的大书、好书，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和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还有规模更宏大的，比如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工程”。这些

书，厚重、扎实、大气，体现了北大文科治学的风格。我还记得这些书最初立项时的一些情形。何校长主管文科的时候，提出要“开大船”，当时有的人不理解，后来我曾写过文章谈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必要的。何校长退了之后，我当过一段时间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深知自己对学术的理解达不到何校长的高度，于是萧规曹随，老老实实按何校长的思路做事情，尽自己的努力支持学者们写大书、出精品。但凡有学者提出了好的想法，或者写出了一部好书，我都愿意用最大的热情去给予鼓励。我觉得，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早一点做，比晚一点做要好，能团结多位北大文科学者一起做事情非常不容易，我们要珍惜时机。

书虽然是十多位学者合著的，有的地方“形散”，但这次重读，我觉得全书的“神”是聚在一点的——这本书的“神”，就是中华文化的自信。

中华文化遭遇过多次危机，最严重的当然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危机。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中外文化交流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中国人挨打、挨骂，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然后出来了很多极端的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化上不自信，认为非得把旧的文化连根铲除才有可能“脱胎换骨”。可失掉了自信力，却只能加剧中国的危机，“全盘西化”救不了中国。只有自尊、自爱、自信，才能自主、自觉地开展对外交流，才能真正学到外国文化中的好东西。如果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不爱惜自己的历史与传统，那么所谓中外文化交流就很可能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文化殖民，中华文化就没有“返本开新”“旧邦新命”的机会，这不仅对中国人来说是悲剧，对整个人类文明而言都是悲剧。

联想起最近所读的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以及几年前北大出版社所出版的那套介绍中国风雅文化的“幽雅阅读丛书”（我曾有幸写过序），从这些书中，我深受启发。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我们的文化开放、包容，有极其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调适能力，中国过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后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文化是活着的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是摆出来给人看稀奇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是几千

年流传下来的方块字，我们的孩子牙牙学语时，家长便教他们背唐诗和宋词，我们与古人之间的心灵是相通的。无论居殿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我们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无论贫富，我们都崇尚仁义。中国的文化既是历史，又是中国人当下每天的生活。任何财富与权力、任何科技与宗教都难以将她撼动。我们做人要谦虚，但对自己的文化必须有自信，“吾心信其成，则无坚不摧；吾心信其不成，则反掌折枝之易亦不能”，假如我们中国人自轻自贱，那中华民族怎么可能“走向复兴”？更进一步说，蒋廷黻就曾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是极浓厚的，而种族观念比较淡泊，假如我们不认同、不热爱、不传承中华文化，那我们民族可能连基本的生存和延续都会成为问题！

三

读《中外文化交流史》还须明白，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文明，并没有高下之分，彼此平等，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在漫长的交流过程中，总体上看融合发展是主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应该看不起谁。习近平主席去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讲，提出了“新文明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的交流互鉴，并认为这是文明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这也为我们理解和解释人类文明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则。

过去有学者说文化之间没有“中西”之别，只有“古今”之分，这我也不是太能够同意。中华文化或者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会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未来不是与西方同化，我们要学习，但也要超越。

谈文化自信，当然必须警惕虚骄自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与“天朝上国”的盲目、封闭有直接关系。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和融合愈加紧密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更需要在与西方文明以及世界其他各个文明的接触、对比、交流中坚定自己的信心，必须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取长

补短、洋为中用。

今天，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我想，假如何校长还在，在再版的时候，他肯定还会再增加一些相关的篇幅。实际上，在本书中，对于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论述也是很充分的，丝绸之路是“物质”的，而丝绸之路的精神则是贯穿了全书的重要线索。在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也带回来“西域”与“西洋”的物产和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影响了中国的历史。我们要深刻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就不能不认真学习两千多年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而通过学习、研究历史，也就能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战略贡献力量。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能够把历史的智慧用起来，让文化的力量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值得赞赏。假如今天的中国人能继承当初玄奘西游的精神、鉴真东渡的精神，能把丝绸之路上那种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精神发扬光大，那中国的未来必定是辉煌灿烂的。“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更不同于近代以来那些西方大国、强国提出的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相似的方案。其中，区别的关键就在于，“一带一路”是在平等的、多元的文化理解、文明对话框架下谈合作，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体现的是中国的“新文明观”，没有恃强凌弱，没有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有这样的文化内核，“一带一路”的推进，必将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加和谐的、跨越国界与文化的“命运共同体”。

我也还想强调一点，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东亚大陆的中心，也与所谓的“内亚”密切相连，在整个欧亚大陆的东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华文化还有着海洋的元素，丝绸之路既有大陆的，也有海洋的，“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包容的，是东方的，也是沟通东方与西方的。如今，中国正在更加深入地融入到浩瀚大洋，未来的中国将不仅是大陆上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还将是海洋交流的中心。这种“中心”与霸权无关，与

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心态无关，而是如盛唐时代的长安一般，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向往，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提供交流的平台。因为我们崇尚的价值，可以用费孝通先生的名句来表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作者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亚太研究院院长、教授）

卷首语： 永远的接力棒

◇ 何芳川

时光倒流，定格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

一天下午，我正在家中读书，周一良老师突然来访。我一阵惶恐、忙乱，一良师依旧是一片淡定的笑容。听了来意，方知这一次老师的“下访”，是来约稿的。原来，“文革”之前，一良师曾在周扬同志的领导和关切下，主持过世界史教材的编撰。那时，周扬同志即有意请一良师再组织编写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未几而“文革”爆发，一切无从谈起。待到尘埃落定，一良师秉承我中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优良传统，不顾已逾七十的高龄，毅然放下手边的研究，决定偿还这笔自己心中的“文债”。其实，那本来无“债”可言，但对一良师来说，却是一种君子的承诺，一份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义务。

在一良师拟定邀约的作者名单中，我是年龄最小的晚辈。蒙恩师青眼，自然受宠若惊。于是一诺无辞，努力从事，终于敷衍成篇，与众多师辈及学长共襄盛举。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就这样问世了。在我国中外文化交流史领域，它无疑是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专著性质的成果。

时光竟不能倒流。

转眼之间，近二十年过去，我们迈入了新的世纪、新的千年。2004 年早秋时节，周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责任编辑鲁锦襄先生陪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杨华女士来访，希望我将该书修订再版，或者重新组织再编撰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

两个选项中，我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当年的作者中，有几位已经仙逝；有几位年届耄耋，还有的远赴边陲乃至海外。小子何能，岂敢贸然“修订”？！于是仿效一良师当年，重新邀约了一些师兄学弟，撰写一部新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新邀的这些朋友，多是一个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自然百忙。蒙大家慨然允诺，纷纷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专为本书贡献

佳篇，令我由衷感动。

这部新撰《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一良师主编的那一部书，是传承关系。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学术研究、薪火相传，有如接力赛跑。一良师一辈师长的学术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还会一棒一棒地传下去，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

薪火相传，接棒疾行，是我们的义务；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更是我们的责任。这部新撰的文化交流史，与一良师主持的那一部比较起来，我们在下列几个方面努力做了一些改进：

首先，增加了“导论”一章。就文明、文化与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尝试着做一些归纳、梳理工作，并力求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其次，增加了纵向历史勾勒的几章，就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尝试着做一个纵向的勾勒。勾勒的范围，从两汉到明清，限于古代。近代以来的文化交流，未能予以勾勒，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展，加之本人学浅，未敢贸然从事，只能期诸未来。

第三，各章的安排，不再按国名汉语拼音字母先后排序，因为那样容易显得杂乱无章。这次依地区排列，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而西亚、非洲，然后则是欧洲、美洲，由近及远，大致符合我国历史上对外交往的先后序列。每个地区数国再组成一篇，力求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上所述，各位作者均尽心竭力，贡献了佳作。大致而言，与先后召开的三次编撰工作会议所定下的宗旨也还是相符或相近的。由于每位作者的学术背景与研究领域的不同，所撰写的内容也就不尽相同：有的从古到今，比较全面、系统；有的侧重于文化的某一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有的着眼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有的则侧重于这一双向互动中的某一单向。对于读者而言，在求得系统认知时可能受到一定影响。不过，由于这些侧重特定时期、特定领域的文字多是作者们的强项，因而读者对问题的深度上的了解或许有更多的受益。

文化交流的历史图像，是极难把握的。

首先，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就始终处在发展这一动态上。这一动态的难以把握，在于它的多样性。在众多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依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而彼此有别的众多发展频道：有的快速发展，很早就达到过某一时代的巅峰，而后迅速滑落向无边暗夜；有的曾经存在，踪迹鲜明，却由于某种自然灾害或战争而“蒸发”；有的屡屡历经挫折、迂回甚至倒退，却百折不回，千年一脉，不断再造辉煌；有的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沉浮；还有的后来居上，等等。这种动态的多样性，造成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性现象，也给文化交流制作了基本背景。

其次，它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民族创造的文明与文

化，都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是一种立体网络式的结构。正因为如此，诸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自然也是立体网络式的。如果对它们仅仅做平面式的认知与理解，人们笔下的文化交流，一定是苍白的，远远不能表现其错综复杂的无比璀璨。按照常规，我们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物质的（器物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大的范畴，同时要知道它还有众多的、层出不穷的专门范畴。当文明之间发生碰撞，文化之间发生接触，这不同的三大范畴与众多专门范畴的内涵之间，必然发生的交流，显然也呈立体网络状。如果再向纵深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到，不同文明、文化碰撞的时候，即使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容易交换的物质（器物）文化，其中也物化着丰富的制度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内容。而与此同时，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间碰撞，其交流的内涵中，亦包含着对物质（器物）文化赖以产生的不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与理解。

第三，它是双向与多向的，而非单向的。在讨论文化交流时，人们一般都注意到它的双向互动。这一认知，比较起那种单向认知的片面性、偏执性、主观性来，自然是大进了一步。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双向互动的不平衡性，即：在某特定的时期，不同文明与文化相遇的时候，其中某一种处在发展较高阶段的文明与文化，可能对另一文化呈高屋建瓴式的倾斜式“文化出超”。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上述这种双向运动时，就会发现，除了上古时期人类社会处在低级的原始的发展状态因而可能发生比较纯粹的双向运动以外，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典时代以降的文化交流在双向互动中，早已包含了大量的第三、第四乃至更多种文化内涵，因而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其实也是一种多向性互动。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文化交流的立体网络模式。

第四，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时，其璀璨辉煌的物质文化出超现象常常令人眼花缭乱。当人们集中注视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一现象时，其实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事物往往被掩盖了。发掘并探究这些容易被掩盖的比较陌生的领域，尤具重要的价值。例如，在制度、精神层面，中华民族似乎并非出超大户，相反，却有“文化入超”大户之嫌。例如，在古代，佛教、伊斯兰教文明流入中华，甚至基督教文明亦曾在中国境内一度“寺满百城”，而中国的儒家学说流播的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以及近代以来新加坡与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又如，即使在物质文化层面，比较起丝绸、瓷器与四大发明这些高级复杂劳动的产品来，在那些比较简单劳动的物质文化领域，中华民族恐怕也处于“文化入超”之列吧。

内容如此丰富多彩，难以把握的文化交流史，自然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这是一场接力赛，全人类各族人民共同承担的接力赛。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中国学人的责任是不容辞的，除了自己要挺身承担，更要不断与国外同行切磋、合作。文化交流史的学研、撰写本身，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呢！这场任重道远的接力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一良师主编、各位师辈学长共同合作的那部专书，就是我们接力赛的前面一棒；我们接过这一棒，努

力疾跑，尽自己这一棒的一份心和力。这一棒的得失，自本书问世之日起，就已经要请下一棒去评说了。我深信不疑的是，这一永远的接力赛，一棒定比一棒更出色、更完美，更接近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那丰富、复杂、千姿百态的真实。

季羨林先生是当年周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作者之一，本书付梓之际，蒙季老宠赐题词，更凸显了学术接力的意蕴。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张贵来总经理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责任编辑杨华女士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谨致由衷的谢忱！